

最近奥巴马总统就在国情咨文演说中称,美国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的人口占有50%全国财富的地步,这正是我在少年时作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徒最憎恶的。

据报载,苹果CEO库克去年的年薪是920万美元,大通银行与J.P.摩根公司的CEO戴蒙去年收入达2000万美元,星巴克咖啡公司老板舒尔茨更多,达到2150万美元,而VIACOM公司总裁多曼去年收入更高达4430万美元。

在任何人眼里,这些钱都是一生花不尽的。这些占全国人数1%的一级富人搜夺了全国财富的一半,其余才由全国99%的人口分享。最低工资在今日还是每小时7元5角(美元),最苦的年收入不到1.5万元,所谓中产阶级每年收入也不过5万至10万元,到20万成为小康之家,已算是幸运了。怪不得奥巴马总统要求给富人加税,穷人减税。

总统想以对富翁加税,来修补破损公路桥梁地铁,提高教育公费,救济伤病贫民,但

贪婪天性与慈善理想之间

(美)董鼎山

无法获得国会通过。试想,每位年薪千万的富翁,只要承担多一点税项,即可把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树立成各国的榜样。

真正关心穷人的美国巨富中,我认为有三人值得称扬,一是在非洲做慈善工作的电脑天才盖茨,他与妻子设有慈善机构,每年捐款数亿元;一是著名股神巴菲特,他曾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巨富们,共同敦促共和党掌权的国会同意总统向富人加税的建议;第二个是来自东欧,移民美国致富的乔治·索罗斯,思想进步,常为穷人仗言。

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应研究如何实现CEO与普通职工收入公平的问题,但是贪婪的富人都不愿支持此类意向的政府方案。加上一些愚昧无知的茶党人士,根本不愿为公



这些年,买的书、朋友送的书越来越多,不知不觉间,家有三间半书房——

第一间是正式书房。装修新房子时,特意打造一间二十多平米、怀旧风格的书房:位置在三楼东边南面,斜屋顶上开着天窗,窗下写字台宽宽大大;

这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吧?我在这里读书、写作,思索、发呆。

第二间是电脑室兼书房。这里原来是儿子的地盘,书房有两个书架,里面是儿子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书,但到他的青年时代,数字化迅猛发展,90后习惯在电脑上、手机上阅读,新书增加得少。后来儿子到外地、外国读书,这里被我占据。书在不停地增加,就

把新书放到他的书架上。

第三间客房兼书房。家里的客房,一年半载没有客人住,就是一处空房间,越来越多的书无处放,我就把朋友送的书放在这里。没有专门的书架,柜子、箱子、茶几,只要可放书的空档都放满书,有三四百本。这是朋友送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与写作的的朋友精神联系的纽带。翻阅和品读这些书,会想起与朋友有关的人和事,字里行间拥有可以触摸的记忆。

第三间半是主卧室。我床头总有几本书,或同时在读,或想读哪本读哪本;先生的床头也有他喜欢的书。双休日午后,阳光充足的房间随意地读,心是宁静的;平常夜晚,就着灯光各捧一本书静静地读,梦是安祥的。书房,让我在回忆和

现实、憧憬和幻想之间自然切换。这是一个网络、视听覆盖阅读,却无法取代阅读的时代。

家里随处可读的书房,让我拥有自己喜欢并适合的生活方式,获得一种心灵的丰富和安宁,与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温柔而淡然地相处。

三间半书房

艾英

书架是以前房子的旧书架,水曲柳木材,黄色木纹,青花瓷瓶里放着一些书画卷轴;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名家书画、摄影作品;蓝印花布桌布;顶灯为国画灯,台灯是竹子做的灯罩;竹篮里一簇干花,是绿色满天星和紫色勿忘我;挂在墙上、放在斜屋顶多宝格里、摆在书架上的装饰品、小玩意儿,是我多年来在

城市和山水间行走之后收获的宝物……这里有我生活的印迹,心灵的回忆,更主要的是有五六千册书。书以文学居多,也有历史、哲学、艺术、新闻等方面书籍,有许多精装本、豪华本,还有英文原版书,在整齐有序地排列。有些书已经泛黄,似乎吹弹即破,留有旧时气息;有些书干干净净,就像没读过一样。书房自然也干干净净,这



流言

周炳揆

有人群处,必有流言。面对流言,如果你反应过度或者是为自己辩解不当,则无异于给流言火上加油。有道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意谓对于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应当不予理睬,使其不攻自破。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年我为某外资企业工作时,被任命为某产品系列的区域经理,一时办公室流言四起,称我并不具备该产品系列的技术背景,又说我会被调离等等。我觉得有必要制止这种流言,否则会造成整个团队人心浮动,以致无法完成公司确立的年度销售指标。于是,我仔细斟酌了几句话,分别约属下每一个小组开会,用平和、拉家常一般的语气说:“我听到了一些闲话,说是我干不了这个工作,当然,这些话一定不是出自于你们几位……”对方解除了戒备,我和他们的距离拉近了,我告诉他们:自己非常愿意向他们学习产品的技术知识,也期待他们的通力合作以完成当年的销售指标。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起来,我乘机把自己的守势转为攻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会在这个职位上坚持下去,如有问题请随时找我谈。”流言蜚语顿时销声匿迹了。

不过,有时候,流言也有积极的一面。我参加过一次名为“积极沟通”的培训,一位英国培训师讲道:办公室的流言,会在有意、无意之中给予工作业绩不好,比较自私的同事一些压力,促使其表现有所改进;另外,对于在公司中地位比较低的员工来说,办公室流言是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话是可以这样说。不过,当年我们公司录取新员工时,都会向他(她)讲明,公司有纪律“禁止在办公室散布流言”。



腊梅迎春 (中国画) 孙毅

我是个影迷,能看队到名演员已是大幸事,能认识他们并被他们认识,那就是大大幸事了。这样的大幸事我总算碰到过,那就是认识张瑞芳同志并被她认识。演《李双双》里李双双的张瑞芳同志,我想大家都认识她。

记得解放初期,我翻译的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受到广大青少年欢迎,卢湾区图书馆在文化广场开读者大会,请我去介绍这本书,我讲完后还请张瑞芳同志朗诵其中一章。这次大会情况热烈,不过我想,不少读者是冲着张瑞芳同志来的。我可是也像这些读者一样雀跃,因为见到了张瑞芳同志,并且打招呼,认识了她的。

真正认识张瑞芳同志并被她认识是在她担任上海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当时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有一回参加由张瑞芳同志领

队的访问团到崇明去。这样一来,我们真正相互认识了。访问结束开联欢会时,有同志提出,希望张瑞芳同志表演个节目。张瑞芳同志毫不犹豫,拿出一个记事本,当堂朗诵其中一首诗,那竟然是我写的儿童诗《爸爸的老师》。她竟把它抄下来作为朗诵资料了!我真是受宠若惊!

在政协,我和张瑞芳同志见面多,也比较熟了。

还有一个机会让我和张瑞芳同志能够见面,那就是我们都曾是少年儿童出版社《故事大王》杂志的顾问,过去每年聚会一次,总能见到面的。

如今碰到播放张瑞芳同志的电影,我绝对不放过。

这正是我这个影迷的大幸事:我认识张瑞芳同志,张瑞芳同志也认识我!

张瑞芳认识我

任溶溶



春节假期,我的一个学生领着他的儿子,抱着孙子上我家拜年。虎头虎脑的小孙子一看见我,就奶声奶气叫我“太爷爷”,一时弄得我不知如何答应才好。一下子我的辈份又升了一级,成了“四世同堂”的“太爷爷”了。我的学生赶快解释:“古人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是您的儿辈,我的儿子是您的孙辈,那末,我的孙子不就是您的重孙了。”如果按这样的论资排辈来算,我确实应该是“太爷爷”了。

我的职业生涯中,有20多年是做教师。的一生中教过多少个学生,自己也难以算清楚。如今,我走进各家银行、证券交易所的营业大厅,往往会传来叫我“老师”的亲切声音,每当此时犹如一阵春风扑面而来,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有时我走在街上,遇到一个久违的叫不出姓名的学生,当他亲热叫上一声“老师”时,我的心头总会甜滋滋的。我有许多学生,现在已走上领导岗位,担任着重要职务,每当见到我时,尊敬地叫上一声“老师”时,我的心头总会热乎乎的。我有两个学生自1975年起,每年农历小年夜风雨无阻结伴来看我,屈指算来已有40载了,真比儿子还亲。

假期中,又有一群学生来看我。他们的到来,客厅里顿时洋溢着节日的喜悦。他们那个嘻笑怒骂的高兴劲,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因为在我的世界里,他们仍是一群淘气的孩子,仍然充满着当年的活力和朝气。不论身居高位,还是下岗在家,都是当年同学中的一员,有喜悦大家分享,有困难大家帮助。我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馈赠给学生,便拿出我这几年出版的散文集,由他们自己任选两本,签名后送给他们。学生说:“这是最珍贵、最值钱的礼品。”我想也是,因为这里面凝结着我的心血,面对这些优秀的学生,我当然要拿出最能代表我炽热情感的礼物,想来也只有这些自己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书了。

人活在世上,物质财富是重要的,但是人也是不能没有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同学情。许多学生日后也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我们之间亦师亦友,他们是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生命才更充实,才显示了它的真实价值。我深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小生命,加入到我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

因为在外地开会,我没能参加接力社在京举办的“佐野洋子追思会”,我在书面发言中说:“佐野洋子走了,留给我们的是她对生命和爱情独到的体味和诠释。虽然她没有完成描绘老北京的图画书《四方形的天空》,但是,她的许多作品让我们读懂了爱,读懂了生命!”

十日谈

安房直子和她的魅影森林,请看明日经典童书背后本栏。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的中文简体字版自2004年9月在北京出版,眨眼已经过去了10多年。

2002年,在接力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会上,国际合作部提出选题建议——出版佐野洋子的图画书《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佐野洋子是享誉世界的图画画家,本书是她的代表作,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出版以后,被收入日本小学生课本,在日本的累积发行量达到了150万册,译为多种文字。对于这位画家、这本图画书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大家赞誉有加,可是,有人赞成出版,但也有人反对,反对的原因是市场问题。

当时,中国图画书的出版刚刚起步,精装图画书定价高,一年发行万把册,就相当好了。我记得,当时我和大家谈:对经典童书,要有耐心,要慢慢培育读者。好书犹如金子,是金子总会发光。出版社要出畅销书,但更要出品牌书、精品书,即使发行量不大,这样的好书也值得出版。很快,选题通过了论证,国际合作部向日本讲谈社递交了版权申请。因为讲谈社和接力出版社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合作,彼此都很信任,

负责讲谈社中国版权事务的刘悦先生和大家都熟,没费周折,接力出版社就取得了授权。

为了确保大家名作的译文质量,体现文本的特色和价值,我们特别邀请了在日本福音馆工作多年的佐野洋子的好朋友唐亚明先生翻译,译文质量很好。

2004年9月,此书的简体中文版和读者见面,首印1万册,一年的时间发行了5000多册,库存4000多册,但大家没有气馁。编辑部、推广调研部、发行部不断强化这本书的推广宣传,举办了多次推介会、品鉴会、鉴赏会,利用多级媒体进行宣传,《活了一百万次的猫》这块金子开始发光,慢慢展现出了经典的魅力,从一年销量几千,到一年销量过万,现在一年销量超过十万,总销量超过了60万册。据说,这本图画书不仅孩子爱读,很多年轻人还把它当作爱情的信物、情人节送给心上人的珍贵礼物。我与佐野洋子见过两次面,第一

次是2005年秋,她在唐亚明先生的陪同下来北京,在朝阳区图书馆,佐野洋子和读者进行了交流,并用日文为读者朗诵《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在那次的交往中,我和她谈到创作心得时,她说:“作家、画家一定要有独特的生命感受,只有有了独特的生命感受,作品才会与众不同。作家画家不可以活得太安逸,活得太安逸就缺少了创作的激情。”我觉得她说出了创作的真谛:作品不只是字符,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独特的真实的生命感受。

佐野洋子的父亲很喜欢中国,在日本读大学期间,攻读中国历史,研究孙中山。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携夫人来中国,在北大任客座教授。佐野洋子1938年出生在北京,7岁随父母回到日本。2007年5月,已身患重病的佐野洋子又来到北京,一是想重游出生地,了却此生的最后心愿。二是想重新体验北京四合院的生活,创作一本描绘老北京的图画书《四方形的天空》。她答应我,中文简体字版一定交由接力出版

永生的虎斑猫

白冰